

唐代文學研究叢書

劉國盈 著

唐代
古文
運動
論稿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唐代古文运动论稿

刘国盈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唐代古文运动论稿

刘国盈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统一书号, 10094·516 定价, 1.45元

目 录

论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1)
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	(18)
论陈子昂	(31)
唐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元结	(45)
韩愈的生平	(57)
也论韩愈其人	(78)
论韩愈和永贞革新的关系	(86)
韩愈的政治倾向	(102)
论韩愈的散文艺术	(122)
韩愈和古文的理论建设	(141)
《师说》解	(159)
再谈《师说》	(164)
《原道》和“诛民”说	(169)
韩愈和柳宗元	(177)
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204)
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	(243)
杜牧和古文运动	(252)

皇甫湜和古文运动	(269)
李翱和古文运动	(284)
皮日休和古文运动	(299)
孙樵和古文运动	(308)
唐代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	(321)

论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唐代的古文运动，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其光辉的业绩。然而，在唐代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古文运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古文运动？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却很少有人专门论及。有些论著虽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不是语焉不详，就是说得比较空泛。因此，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答案。

古文运动所以发生在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而不发生在唐初，不发生在隋代，更不发生在这以前，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考其原因，约有三端：一、文体改革发展的必然，二、作者队伍的壮大，三、时代的需要。兹分述如后。

一、文体改革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古文运动的产生也是如此。它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但它也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就能够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如所周知，中国的文章，从先秦时起，主要就是奇句单行

的散文体。但是，到了汉代，这种奇句单行的散文体，却受到了辞赋的挑战。辞赋这种文体，主要是继承骚体的传统。但由于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汉代的辞赋家们，已经没有屈原的那种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他们往往只注重抒发个人的纤弱的感情和宣扬统治阶级的享乐豪华生活，文风开始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

到了两晋，随着门阀势力的日趋强大，文化特权完全控制在门阀势力的手中。为了掩饰他们空虚的生活内容，开始出现了骈体文。骈文在艺术形式上有许多创造，当然不能一笔抹杀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骈文这种文体，太注重形式美了，所谓“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句的字数必须是骈四偈六，“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平仄也要求配合，“辘轳交往”，其他如用典、比喻、夸饰、物色等，也各有讲究。在形式上有这么多的限制和讲究，文风自然愈来愈不注重内容，而畸形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起来了。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到了南朝，又受到了梁、陈宫体文学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作家，不管形式和内容是否搭配，几乎是无文不骈，于是形式主义的文风，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骈文这种文体，是应贵族大地主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对于拥有教育特权的士族子弟来说，掌握这种文体，自然并无太大的困难。但对于要求自由表达思想的庶族地主来说，这种文体无疑就是一种桎梏了。因此，当门阀势力极力提倡形式主义文风的同时，反形式主义文风的力量也就有意识地在进行抵抗。西晋太康时期，潘岳、陆机是两个骈文的吹鼓手，而夏侯湛则仿《尚书》体作《昆弟诰》以相对抗。徐陵、庾信在南朝

大写骈体文，而北朝西魏的宇文泰则提倡复古，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以为文章的程式；北齐的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南朝的刘勰，更是一方面对于离经叛道的“浮诡”、“讹滥”的文风大加挞伐，指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①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文必“宗经”的主张。

刘勰所主张的文必“宗经”，也就是文必宗“道”。因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而“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②。这在事实上，也就是为而后的古文运动中所提出的“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作了张本。

到了隋、唐，不论是在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上，还是在探讨新文体的建设上，都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上，首先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了。不仅是文学界、思想界，而且政治界也有不少头面人物参加到反形式主义文风的行列中了。隋文帝以帝王之尊，直接出面干涉不健康的文风，他曾强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章华艳，还因而获罪。李谔、魏征、李百药、薛登、姚思廉、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在政治上都是一时的著名人物，他们也一致认为六朝以来淫靡的文风，对政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应“断浮虚之词，收实用之良策”。至于文

①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② 同上。

学界、思想界，参加反形式主义文风斗争的人就更多了。隋代的王通，初唐的王勃、杨炯、卢藏用、陈子昂、刘知几、傅奕、吕才，中唐的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其次是对形式主义文风不健康因素的批判，更深刻也更具有说服力了。指出形式主义的文风，一、在政治上为害很大，是所谓的“亡国之音”，“贵之而江东乱，用之而中国衰”^①。二、在内容上“都损事实”，“寻虚逐微”，“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②。三、在形式上“妄益文彩”，“俱是淫声”，“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总之，形式主义文风，背弃了“大圣之规模”，对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这对形式主义的文风当然是沉重的打击。

在批判形式主义文风的同时，还积极探讨了开创新文体的道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创作实践上的摸索。在理论建设上，提出了一、文是贯道的工具，所谓“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③。二、文道必须统一，所谓“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④。三、文要有“道德情性”和“救世劝俗”的作用，所谓“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⑤。四、作家必须重视主观上的修养，所谓“先道德而后文学”。总之，新的文体必须征圣、宗

①王勃：《上吏部裴侍郎书》。

②《隋书·李谔传》。

③王通：《中说》。

④柳冕：《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⑤元结：《二风诗论》。

经，以圣人为楷模，以六经为源泉。这在事实上，已经把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在创作实践方面，也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夏侯湛和苏绰仿《尚书》体作《昆弟诰》和《大诰》，走的完全是复古的道路，是完全失败了的。到了陈子昂，他虽然强调复古，但是，他已经不是泥古不化了，他的“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可是，已非佶屈聱牙的古文。富嘉谟、吴少微改变了碑颂的写法，“属词皆以经典为本”。张说、苏颋已经完全不用骈体文写章奏，到了肖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出，基本上已变骈为散，新的文体已经初具规模了。

总之，对形式主义的文风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又建立了新的文体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摸索出了一条写文章的可行的道路。这还不意味着文体改革的发展形势，已经完全成熟了吗？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一个领袖性的人物登高一呼，古文运动的波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掀起来了吗？

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的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

情况就是如此。当文体改革客观形势发展需要一个领袖性的人物出现时，这个领袖性人物便被创造出来了。他就是韩愈等人。韩愈等人登高一呼，古文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这固然不能抹杀韩愈等人个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这还是由于文体改革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作者队伍的壮大

韩愈在《与崔群书》中说：

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

和韩愈“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李翱在《答韩侍郎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说：

如兄者颇亦好贤，必须甚有文章，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汲汲孜孜，无所爱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则分食以食之，无不至矣。

一则曰“甚有文章”，再则曰“兼能附己”，三则曰“顺我之欲”，指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所谓“甚有文章”，指的当然是那些很会写古文的人了。“兼能附己”的意思可能比较多，但毫无疑问包括着在文学的主张上，要附合韩愈的观点。“顺我之欲”不也是要求以韩愈

的意志为意志吗？这样看来，和韩愈交往相识的千百个人，不都是古文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吗？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试想，直接能和古文运动领袖交往相识的古文作家，就不下千百人之多，那么，没有机缘或没有资格直接和古文运动领袖交往相识的古文作者，必然会更多。有这么多热心于作古文的人，古文运动的产生难道还不是必然的吗？

问题是到了韩愈所生活的贞元、元和年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热心从事于写作古文的作者出现呢？

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如上所说，骈文既然是豪门地主所提倡、所支持的，那么，反骈文的古文作者必然是中、小地主，也就是所谓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了。当然，到了中唐，士庶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士族下降为庶族的，有，庶族上升为士族的，也有。不过，只要看看参加古文运动的中坚分子的出身，就可以知道，反骈文的古文作者，绝大多数都是一些中、小地主的知识分子。因而，在贞元、元和年间所以会有那么多热心从事于古文写作的作者出现，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了，而是豪门地主和庶族地主长期斗争、力量互相消长的结果。

自从豪门地主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权利，自然就引起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反抗和不满。反抗的力量在起初是薄弱的，但是，随着豪门地主的日趋腐化，反抗的力量也就日见强大。到了隋、唐时期，庶族地主便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了。

隋文帝杨坚，就憎恶豪门地主，他统一中国后，曾采取了种种抑制豪门势力的措施。但由于隋代的时间很短，因而庶族地主的势力还没有成长壮大起来。

唐承隋制，继续采取抑制豪门地主的政策，如：士族是具有强烈的血缘关系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他们重视谱牒，区别郡望。为了打击他们的势力，唐初曾两次官修谱牒。第一次是唐太宗李世民命高士廉修的《氏族志》。高士廉修《氏族志》时，依照习惯的势力，把山东士族崔干列为一等。唐太宗看后，明确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崔干硬降为三等。到了唐高宗时，庶族地主出身的武则天和李义府，见《氏族志》上没有他们的家族，于是就重修谱牒，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入后姓、酈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等级，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搢绅耻焉，目为勋格”^①。如果说《氏族志》还多少照顾到士族传统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姓氏录》就完全是以当时官爵的高下定等级了。这种定等级的办法，当然对士族是一个打击。

士族“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隋时杨素娶士族崔儆的女儿为儿媳，结婚的那一天，“儆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儆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②。杨素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封为国公。对这样的人，士族尚且如此凌忽，其对一般庶族地主的傲慢，就更可想而知了。为了打击士族的这种气焰，高宗下令禁止士族自相为婚。

武则天出身寒微，拥戴她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是庶族地

① 《新唐书·高俭传》。

② 《隋书·崔儆传》。

主出身的。因此，武则天对于士族地主就更苛刻。她当权后，除杀戮贬逐唐的宗室外，还杀了不少士族出身的官僚，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于志宁、裴炎、程务挺等。

士族常以名教礼法为标榜，如隋时京兆士族韦师，“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于是“居丧尽礼，州里称其孝行”。正因为如此，因而相应地士族也就重视儒家的经典。古时的经学都有师传，而且门户森严，非士族出身的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经学家。为了打击士族，高宗时把诗赋列为考试的必试科目，自此以后，诗赋就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

在经济上，士族原来也有特权，如有品爵者除按规定可以占田外，国家还按品级给与佃客、典计和衣食客。隋文帝时，就大索貌阅，制定输笈法，这在经济上就是为了打击士族。

在政治上，士族一向依仗其门第，把持政权。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分科举人，唐高宗时更创立进士科，打破了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这在政治上对士族自然更是沉重的打击了。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庶族势力也就愈来愈有力量了。特别是罢乡举、分科举人，更有助于庶族势力的成长。《新唐书·柳冲传》上说：“隋……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通典·选举典》上也说：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

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隩彦韞毓行者，咸出于是……

为了“征文射策，以取禄位”，“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只要是“家给人足”，就连“五尺童子”，都“耻不言文墨”。就这样，从隋大业时起，到唐贞元、元和年间止，经过二百年的努力，庶族地主不仅在政治上已经很有势力，在文化上不是也很有修养了吗？庶族地主既有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那不是必然会组织起一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文化大军吗？这就无怪乎和古文运动领袖直接交往相识的古文作家，就有千百个人之多了。

三、时代的需要

程千帆先生在其近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谈到《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时说：“进士行卷之风同样有助于古文的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是古文作家应举时，虽然遵照功令，必须以时文——甲赋、律诗应试，却往往以古文行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达到既取得了功名，又推行了古文的目的。第二是当他们登第为官以后，逐渐上升为当世显人时，便又凭借其社会地位来鼓励后进之士也走他们的道路，并且利用回答后进之士向他们行卷以请求提拔和教益

的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文学主张。这乃是韩愈等人当时进行文学斗争所运用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显然是有效的。

韩愈等人是否有意识地通过行卷这种策略来推行古文运动的发展？可以姑且不论。但是，从程先生的这一段话中，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韩愈等人通过行卷这种策略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为什么会奏效呢？

上文已经谈到，隋文帝以帝王之尊，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也没有掀起来一个“并宜实录”的文体改革运动。而韩愈等人都不过是一介书生，为什么仅仅采用了行卷这么一种“基本策略”来推动古文运动，就显然奏效了呢？在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了。如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也是一次文体改革，在这次文体改革中，提倡白话文的，都不过是一些书生，而北洋军阀以其政府之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可是，最后还是白话文取得了胜利，成为了大家所公认的一种文体，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也是什么策略上的失败和胜利吗？两军对垒，是不能不讲策略的，策略上的正确与否，对于成败也的确关系至大。但是，策略的运用，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能成功。白话文所以战胜了文言文，并不是什么策略上的胜利，而是时代需要的结果。那么，古文运动的成功，如果和韩愈等人有意识地利用行卷这种策略有关，那也是因为古文这种文体首先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否则的话，再高明的策略，也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在贞元、元和年间，古文这种文体为什么会成为一

种时代的需要呢？

有人认为：“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卒于穆宗长庆四年（八二四），这一个杰出的古典散文家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唐帝国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逐渐由中衰转向中兴的时代，因而它又是唐代文化再度发展特别是小说散文发展最盛的时代。”^①这就是说，古文运动的产生，是中兴的唐代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事情果然是这样的吗？恐怕未必。

是的，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也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曾经论证并一再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平衡。古文运动的产生和中唐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平衡的？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可以置而不论。重要的是要具体分析一下韩愈所处的从代宗大历三年到穆宗长庆四年这几十年的历史。

在韩愈所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改革运动：政治上的永贞革新，经济上的漕运法、榷盐法和两税法的实施，文化上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永贞革新是失败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次革新运动呢？难道是由于唐代的中兴而不是由于它的衰落的结果吗？懂得这一段历史的，恐怕谁也不会认为永贞革新是中兴的唐代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而恰恰是相反的吧！漕运法、榷盐法和两税法都得了贯彻，而且都取得了好的效果。问题是为什么要实行漕运法、榷盐法和两税法，而不继续实行租庸调法呢？这不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困境被逼得不能不改弦更张的吗？再看看新乐府运动产生的原因吧！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谈到他写讽谕诗的动机时，说

^①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